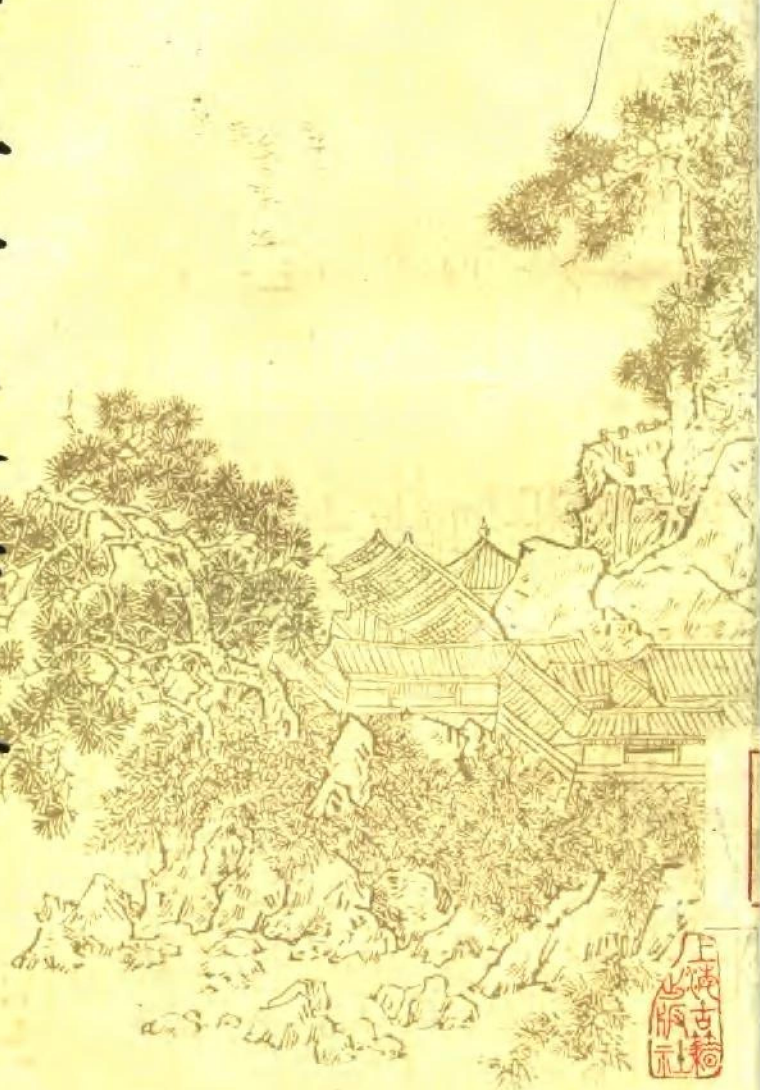


唐五十家詩集



I222.742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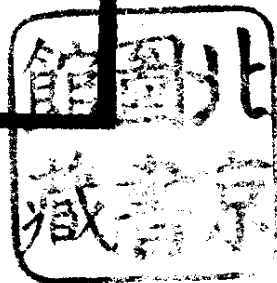
331

E477/02

唐五十家詩集一

明銅活字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A 827360

唐五十家詩集
(全八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44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200

統一書號: 10186·285 定價: 15.20元

前言

我國的活字印刷術，有著源遠流長的悠久歷史。從現存材料看，早在北宋初年的慶曆（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間，就已經發明了用膠泥燒成活字用來印刷書籍的記載（三，宋歐州最早用活字印刷《聖經》的谷騰堡提早了四百年。可惜這種用泥活字印刷的書籍沒有被保存下來。

到了元代初年，東平人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並且還設計製造了排字用的轉輪字盤架。他在旌德任上時，曾用自己製造的木活字花一個月時間印刷過一百部有六萬多字的當地的縣志——《旌德縣志》。可惜這部縣志也沒有流傳下來。但從《農書》後面附載的《造活字印書法》一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王禎造木活字印書的情況。同時從這篇文章中，我們知道當時除木活

字印刷外，還有用燒熟瓦字和鑄錫字這兩種活字印刷的方法。在王禎以後二十多年的至治二年（公元一三二二年），馬稱德曾在浙江奉化雕刻了十萬個木活字，印刷了《大學》、《義》等書。由於這些早期的活字本書籍都沒有保存下來，因此很難對當時活字印刷的情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到明代，活字印刷進一步受到社會的重視，除江浙一帶的無錫、常州、蘇州、南京、杭州等地外，福建的福州、建甌、建陽，以及四川、雲南等地區也都用活字來印刷書籍。在製造活字的材料方面，除使用木、鉛、錫以外，還使用了大量的銅，從而使銅活字印刷的書籍在明代活字版書籍中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此五十種唐人詩集，為銅活字印本，因無印行者姓氏及印書牌記等有關材料，故歷來各藏書家多以「明活字本」著錄，而不詳其印行年代，甚至竟有認其為宋時印本者。如鄧邦

述在其《寒瘦山房叢存善本書目》卷二《曹子建集》條下說：「案師書友譚篤生得唐人小集多種，畧余云是宗活字本，其字體與此極相彷彿。沈叔亦得多種，竟定為宋刻。而葉德輝在其《郇園讀書志》卷七《韋蘇州集》下則逕定該本為「北宋膠泥活字印本」。《中國版刻圖錄》則根據其字體紙墨，疑其為弘治、正德年間蘇州地區印本。

此五十家詩集版式一律，錢黑口，單魚尾，魚尾下為集名，卷、頁，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版式寬疏，清朗悅目。所收均為初、盛、中唐詩集，無晚唐人作品。作品收詩、賦，兩部併，先賦後詩，詩歌全部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六絕、七絕等詩體排列。全書雖無印行序跋及印行牌記，但可肯定是一部出於一手的大型唐人詩集叢書。對此書印行年代，根據其本身所具特點，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明人刻書版式，弘治以前喜用大黑口，雙魚尾或三魚尾，四周雙邊。正德以後，此一風氣逐漸有所改變，大都喜用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的格式。此詩集与此格式接近。而在當時活字本中，其字體、行款等版式與此集最為近似的是《小字錄》和《曹子建集》。

活字本《小字錄》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黃丕烈得此書初印本，於重付裝潢時檢出覆背紙弘治十五年都穆（吳郡人）撰《陰何詩》跋文一葉，云吳人孫鳳用活字板印之。由此可證此《小字錄》當為弘治十五年以後印本。明銅活字本《曹子建集》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中國版刻圖錄》據正德五年舒貞刻《陳思王集》四澗序，疑此書為長洲徐氏印本。舒貞過長洲時，尚能得此書百餘部，則其印行年代當上距正德五年不遠。据此可知，在弘治末年、正德初年間，此種字體、版式已在活字版書籍中有所出現。

二明人刊刻唐人詩文集，成化前刊本現所見者數量不多，弘治以後，數量稍多，但大都為另本單行，尚未見有大量刊刻彙輯為叢書者。正德以後，不但單刻本大量增加，且有彙刻為叢書者，如正德八年鮑松韓本《李杜全集》、正德十四年吳門陸氏刊本《唐五家詩》等。僅劉成德一人，於正德十年至十三年前後這一段時間內，就曾刊刻過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李頎、岑嘉祐、皇甫冉、皇甫曾、韓君平、郎士元、耿津、王建、張籍，以及《白氏諷諫》等十多家唐人詩集。可見刊刻唐人詩集已為時人所重視。嘉靖以後，彙刻唐人詩集之風氣尤為盛行，如嘉靖十九年朱警輯刻《唐百家詩》、三十一年張遜業輯刻《唐十二家詩》、三十三年黃貴曾輯刻《唐詩二十六家》。此外又有蔣孝輯刻《廣十二家唐詩》、無名氏輯刻《唐人小集》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家所刊叢書（包括劉成德所刻各唐人集）除《唐百家詩》收錄

晚唐人詩集外，其餘各家所收均為中唐以前詩人作品，而將晚唐詩人排斥在外焉。此種現象之出現，似與當時文壇風氣有直接聯繫。明成化以前，文壇佔統治地位的是由統治階級上層人物領導的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形式雍容典麗的所謂「臺閣體」的作品。弘治年間，由李夢陽、何景明等為代表的「前七子」起來反對這種文風，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口號。他們積極鼓吹，相互號召，形成了一個創作流派，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其時間已經到了正德年間。

三、從編排形式看，弘治以前唐人詩文集詩歌分類大都以詩、雜詩、雜著（詩）等標目，如成化刊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弘治刊本《陳伯玉文集》、正德重刊弘治本《歐陽行周文集》等等。間亦有以詩體分類者，如成化刊本《唐甫里先生文集》分為五言古詩（附七言古詩）、五言八句詩、五言絕

句詩、七言八句詩、七言絕句詩、雜體詩數類，其所用名稱與排列次序亦與正德年間為多數唐人詩集所採用的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為排列次序的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情況，再從五十家唐人詩集的規模、內容、編排形式等各方面加以考察，這部大型叢書的產生年代似不應早於弘治以前，而可能即行於稍後的正德年間。而從明代銅活字印刷的整個發展情況來看，當時最發達的地區是現在江蘇南部的無錫、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從此書採用的字體、版式等各種特徵來看，它產生於上列這一帶地區是完全可能的。

對明代銅活字本的評價，歷代藏書家對之毀譽不一。非之者以為活字版書「易行而連售」，而又校對不善，因之遺文

脫字，「繆誤不可枚舉」，甚至「前後錯雜，至不可句讀」。黃丕烈則認為「古書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不在先也」。楊紹和亦以為「明刊各書，以銅活字本為最善」。葉德輝則認為「活字攝印，固不能如刻印之多，而流傳至今五百年，蟲鼠之傷殘，兵燹之銷燬，愈久而愈稀。此藏書家所以比之如宋槧名鈔，爭相寶尚，固不僅以其源出天水舊槧，可以奴視元明諸刻也」。他們所著眼的最主要一點，是這些銅活字本不僅流傳至今四五百年，愈久而愈稀，而且所據皆舊本，源出天水舊槧。

關於此銅活字本唐人詩集與宋本之間的關係，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曾有所論述。他在《善齋集》下指出，此本「前賦後詩，與嘉靖間徐獻忠所刊唐詩百家次第一式，當從宋本出」。在《張說之集》下也說：「此本一卷，前有賦五篇，後分體詩共

三百首，與文集前編詩四卷首數無大出入，當從宋時單刊詩本重刻。由于此五十家唐人詩集全部經過編印者重新分類編排，除《駱賓王集》《杜審言集》《孟浩然集》《王摩詰集》《儲光羲集》《岑嘉州集》《韋蘇州集》等少數家保留原書部份序傳外，均無其他刻書序跋等材料可資稽考，從而對探索其版本源流帶來了一定困難。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下面各個方面找到一些有關的線索。

一、收錄首數。如《常建集》《天祿琳琅》有宋臨安本《常建詩集》三卷，收詩五十七首，楊紹和《海源閣藏書目》《常建詩集》上卷收詩三十七首，下卷收詩二十首，與此本同。汲古閣本分為三卷，惟多出《吳故宮》七絕一首，則係從《萬首唐人絕句》中輯入者，《全唐詩》本與此同。此活字本無《吳故宮》一首，除在進行分類時以《張公子行》（為五七雜言）一首分入下卷之七古外，其上

卷收五古三十六首（如將《張公子行》分入五古，則上卷為三十七首），下卷收七古三首、五律七首、七絕十一首，共五十七首，與宗本全合。以活字本與《全唐詩》本相校，其異文又多與宗本合，由此可見此活字本與宗本的關係。又如《杜審言集》，此本前有乾道庚寅楊萬里序，云「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郡齋讀書志》亦言其「集有詩四十餘篇」。楊紹和《海源閣藏宋本杜審言詩集》一卷，共詩四十三首。此活字本所收正合此四十三首之數。此外，如《李嘉祐集》，《善本書室藏書志》云：「東山席氏得影宋本《臺閣集》於吳郡柳僉家，列入《百家唐詩》……此活字本分體分卷，然詩則一篇不闕，仍《臺閣集》也。又如《盧照鄰集》，《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讚、碑十七篇。」此活字本收錄情況亦與丁氏所言合。

二、文字內容。如《韋蘇州集》卷一《冰賦》中有「觀其劣足以淒一室」句，明以後各本及《金唐文》皆均作「力」。盧文弨《群書拾補》卷九云：「宗本卷首載此篇，《賦索》卷三十有之，可據鈔入。惟觀其力足以淒一室，宗本力作劣，當從之。劣僅也，不當作力。」此活字本作「劣」，與宗本同。又《淮上喜會梁川故人》詩「何因北歸去」句，他本「北」作「不」，《效何水部二首》「夕漏起遙怨」句，他本「怨」作「恨」，宗本作「北」，作「怨」，亦與此活字本同。又如《顧況集》中《棄婦詞》有「古人雖棄婦」一句，明刻本「雖」作「有」，南宋書肆本亦作「雖」，與此活字本同。

三、避諱及空格。如《岑嘉州集》中《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詩，「匡字避宋諱缺末筆」。又《韋述集》之《春詞二首》中「素手自提筐」句，「筐」字亦缺末筆（富臨安本亦避諱缺末筆）。又如《韋蘇州集》中《簡恒燦》、《寄恒燦》、《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燦》以及《示徒子

河南尉班《詩》「拙直余恒守」中之「恒」字，亦均避諱缺末筆。又如《劉隨州集》中有《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當苗稅免百家俸錢》一詩，《叢書初刊》所收正德十二年刊本（《叢書初刊》編者認為此本係從宋紹興本出）「河南」下有雙行小字「鄉名」兩字，乃避宋高宗趙構嫌名，不書「句」字。此皆字本刪去「鄉名」兩小字（此五十家唐人詩集除《唐玄宗皇帝集》、《孟浩然集》、《包佶集》等尚保存極少量雙行注文外，一律刪去注文），詩題遂不可通，但此正好顯示了它與宋本之間的某種聯係。

此五十家唐人詩集凡遇空格之字，均以空格代替，除陳子昂、孟浩然等十餘家集無空格外，其餘各家自空一字至五十餘字不等，共空缺四百餘字之多。以其空缺之字與他本相較，未可約略窺見各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以《常建集》與宋本《常建詩集》及《全唐詩》本相較，其《張天師草堂》詩中「遂登仙子谷，

因醉田生樽」兩句（據《全唐詩》本），此活字本與宋本「仙」、「石」、「醉」三字均為空格。又如《韓君平集》、其《送中允典邵州》詩中「雙筆還揮王右君」句（據《全唐詩》本），此活字本與席刻《唐詩百名家全集》本「王」字均為空格；《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詩中「禮門前直事仙郎」句，此本與席刻本「仙」字亦同為空格；而《雍丘實明府二詩》中所缺之九字，則三本所缺之字數均同。又如《顧況集》、其《送李泌詩》缺末句五字，明刻本《顧華陽集》及《全唐詩》本亦均缺此五字。由此可見，此活字本中所缺各字，似均有舊本作為依據，而尚無明代後期刻書者任意添改原文的陋習。

四、附錄他人酬贈之作。古人編集，往往將他人有關酬贈作品同時編入，如《王右丞集》之附入盧象、王綬、崔興宗、裴迪等人作品，《韋江州集》之附入顧況、楊凌、丘丹、劉太真等人之作品等等。此五十家集亦間有附錄他人酬贈者，如《張九齡集》有《張丞

相與余有孝廉校理之舊又代余為荊州故有此贈襄陽刺史宗鼎一詩，據詩題及《唐詩紀事》卷二十二，此詩實為宗鼎贈九齡之作，故此下即緊接九齡《酬宗使君作詩一首》。又如《韋蘇州集》有《奉同郎中使君郡齋雨中宴集》一詩，實為顧況之作，嘉靖華雲利本《韋江州集》題上有「附錄」兩字，下具「州民朝議郎行饒州司士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顧況」二十字，連同詩文均為低一格刻印。此活字本於重編時刪削未盡，留此痕迹，但亦可證明此集所據確有舊本。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此五十家集所據雖多宗元舊本，但由於底本來源不一，因此其中也可能有不少根據的是明人所重編的本子。最明顯的如《戴叔倫集》，其集中《畫蟬》、《題天柱山圖》、《贈徐山人》、《寄司空曙》、《蘭溪棹歌》、《蘇溪亭》等諸詩，據《元詩選》、《明詩集》、《盛明百家詩》、《明詩綜》等書，認為是元末明初朱鶴年及明初劉崧、汪廣洋等人的作品。